

七日談

(北京篇)

最近，在四川綿陽召開的「涪江書話——中國書法的當下狀態及前瞻」全國書法理論名家學術研討會上，我談到了當代書法的審美問題。書法既然成為藝術，它首先靠近的就是美術館，成為展覽制度下的一個模塊。書法的命運在這裏開始轉變，它只能在展廳中找出路，於是，追求入選展覽，強調書法的視覺衝擊力，對文辭的輕慢，去文學化，似乎就成了當代書法的主觀選擇。

讓我憂慮的是，部分中青年書法家，也在為當代書法的「技術至上，形式為王」的創作風格進行鼓噪。我曾參加的一個書法論壇上，一位教授提出一個可笑的問題，按照新華字典的順序抄寫，是否可以抄出書卷氣，參會的一些書法家竟喊道：可以。在他們看來，書法只是形式的問題了。

優秀的書法，字形自然挺拔、勁健，典雅、溫潤。不過，這僅僅是書法藝術的第一步，寫字之所以能夠成為藝術，它需要與文辭結合，也就是形式與內容的融通，筆墨與人的互望。啟功曾說：文史不同，下筆空空。啟功所言，就是對競技書法體制下，以展廳為中心的當代書法的憂慮。

一些當代書法作品缺少思想深度，匱乏雄強、渾厚之風，就是因為我們對文辭的忽略，缺少在文辭中幻化出審美力量的能力。雄強與渾厚不是生硬的表現，而是來自生命的感動，始於憂患，終於責任。於是，我談到顏真卿，作為唐代的書法家，他的人生與創作，對今天具有重要的啟發。

我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學習書法的，首選的範本就是顏真卿的書法作品，從

《多寶塔碑》《顏勤禮碑》到《爭座位帖》《祭侄文稿》，開始了長時間的臨習。為什麼要學習顏真卿，因為他有着剛直不阿的性情，有着偉岸的人格，有着高超的書藝。他的一生承擔了國家責任，並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學習書法，學其藝，更要學其人。

對顏真卿的判斷，有其歷史傳統。對文藝作品，我們看重它的雄強、渾厚之風，這是給人以想像，給人以力量，給人以未來的創作與表達。這樣的價值判斷，自然讓我們對趙估、趙孟頫、蔡京、秦檜等人的書法作品一直保持警惕，習慣性地認為，他們的作品與他們的人品相似，沒有學習的必要。

在文學界、書法界，因人廢文、廢墨，因人低估其藝術成就的事情時而發生。因為雄強、渾厚的美學風格是一種文化共識，一旦偏離這種共識，往往會遭到質疑。

儘管對顏真卿存在不同的評價，不過，對其人其藝，始終敬佩有加。他強大的人格力量和藝術震撼力，是傳統文化最為優質的一部分，是中國社會永遠不能或缺的生命力量。學書要學顏真卿，這樣的選擇，是我們對文化傳統的繼承，是我們對現實的反省。人的一生，沒有精神動能，沒有危機意識是不行的，一個民族亦然，僅僅熱衷消費與享樂，迷醉鮮花與香草，前途就會暗淡，未來就會模糊。選擇顏真卿，選擇的正是我們的歷史與現實雄強、渾厚的一部分。從小楷到大楷，從行書到草書，從公文到祭文，從手札到碑文，他的悲壯、厚重，他的奔放、痛苦，他的堅決與無畏，他的優美與昂揚，何嘗不是我們民族精神的火炬與號角。

顏真卿新解

張瑞田



有那麼一段時間，顏真卿的影響有漸漸縮小的趨勢，一些人不再把顏真卿的楷書放在重要位置，顏體楷書很難在當代重要書法展覽上見到。

在顏真卿被忽略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書壇正是充斥雜音與亂象的時候。以詭異的藝術觀念，試圖顛覆傳統，以極具誇張的筆法墨法，熱衷娛樂化，表露出一些書法家的淺陋與無知。

耐心、真誠地閱讀或臨習顏真卿的書法，我們依然會感受到，他的筆墨是中國文化史、書法史中的最強音。我在蒲州古城遺址，彷彿看見了顏真卿揮淚書寫《祭侄文稿》的場景。唐天寶十四年有了安史之亂，時任平原太守的顏真卿率軍抗擊。一場戰爭，顏真卿的哥哥、侄兒戰死沙場。戰爭結束後，顏真卿任蒲州刺史，在這裏寫下了《祭侄文稿》，祭奠犧牲的顏季明，也為書法史留下了光輝的篇章。顏真

◀顏真卿《竹山堂連句》冊。 新華社

卿的楷書作品《宋州八關齋會報德記》，豐富的歷史內涵與迷人的藝術魅力，讓我一次次陷入沉思。田神功將軍是史思明的部將，得知史思明謀反，怒火中燒。在叛將南德信、劉從諫圍攻睢陽時，怒殺南、劉，解除睢陽之危，並率軍歸順朝廷。寶應元年，叛軍再犯睢陽，田神功領兵平叛，再度解睢陽之危。唐大曆七年四月，田神功患病，睢陽人向官府建議，舉辦八關齋會，為田神功祈福。

宋州刺史徐向接納了這個建議，出俸錢在開元寺設八關齋會。河南睢陽的「八關齋會」是歷史事件，也是文化事件。何為八關呢？八關亦稱八戒，為佛教用語，是指佛教男女信徒一晝夜中所必須遵守的八條戒律。為記載這次活動，州郡長官又從千里之外請來當朝重臣、著名書法家顏真卿，由他撰文並親筆書寫。顏真卿接到邀請，親赴睢陽，激情、理性並舉，文章、書法俱佳，撰寫、書寫了近千字的《宋州八關齋會報德記》。可謂文書俱佳，文墨兼優。顏真卿的《宋州八關齋會報德記》，有現實意義。對忠臣良相的稱頌，對貪官污吏的指斥，在顏真卿的書寫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書法創作是藝術創作的一部分，與國家敘事與民族大義形成了一個整體。當代書法創作和作品，需要在深入植根傳統的基礎上，勦力尖銳、豐博、深刻、激越的重大題材，細緻感受筆墨間的悲劇力量，予以美的暗示與提醒。

向風而行



黛西札記 李夢

部，在其中撿拾些許日常生活的浪漫與驚喜，短暫地逃離繁雜工作和家務，真真有益身心。

兩部內地劇集分別在二〇二三年初及二〇二四年末上映，或也應和歲末年初觀者對於愉悅浪漫故事的渴求。情節上，兩劇也頗有些相似之處：都是近兩年內地電視劇的口碑之作，都關乎都市男女的愛情、親情和友情，都試圖在看似尋常的相遇和相處中，探討「故鄉」與「他鄉」等形而上的恆久命題。主演都是新生代當紅的俊男美女，一顰一笑皆引人注目，劉亦菲和鍾楚曦等人的衣着裝扮和喜好習慣（如看書、養寵物、下廚煮麵等），更是引來一些網友效仿，可見如今劇集的影響力早已不僅僅是電視熒幕內外的事情，更深入衣食住行等日常的方方面面，成為觀者的情緒投射與心理依傍。

收穫一眾擁戴之餘，兩部劇集播出後，均帶動在地文旅發

展：《去有風的地方》中對於雲南小鎮民情風物的生動呈現，讓大理這座本已是熱門旅遊地點的網紅城市，再一度成為北上廣深職場打工人士度假甚至創業的夢想地；《燦爛的風和海》雖說是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的獻禮之作，敘事和抒情方式卻並不刻板，宏大命題讓步於清新動人的邂逅、相愛與重逢種種細節，將澳門城市的風情與氣質，歷史與當下展現得輕鬆又自在，看似隨性，實則每一處取景、每一個日出與月落的瞬間背後皆精心鋪排，仔細雕琢且不露痕跡。

如是成功嘗試，對於香港的文旅發展亦不乏啟發。香港既有熱鬧的街巷，也有隱世的絕美山海，開埠以來融會中西，長養出獨特的城市氣質與性格，曾是《變形金剛》等不少荷里活知名電影的取景地，近年上映的本地製作如《幻愛》和《九龍城寨之圍城》等，對於城市自然風景與非遺民俗等的描摹與呈現，也讓人印象深刻。在年輕一代的消費趨向逐步轉入情緒消費和體驗消費的時候，香港文旅從業者或應更多思考如何將影視IP與城市資源深度融合，製作出更多展現香港當下面貌的清新敘事，讓香港故事鮮活生動，常說常新。



英倫漫話 江恆

故事始於一九八五年，年輕的查理，伯雷爾從祖父那裏繼承了西薩塞克斯郡克內普莊園三千多英畝的農場。但這並非令人欣喜的遺產，卻更像是一個燙手山芋，因為隨着英國轉向集約化、工業化的農業模式，土地變得日益貧瘠，莊園也不斷虧損和難以為繼，直到被破產的陰影所籠罩。二〇〇〇年初，查理夫婦在參觀了某歐洲知名自然農場之後受到啟發，萌生了讓自己的農場也回歸自然的想法，並將其命名為「野化計劃」。

在後來的訪問中，查理夫婦將計劃形容是一個需要極大勇氣的「放手」過程，即放棄了所有景觀和農業的固有觀念，把農場完全交還給大自然，使其努力恢復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他們在此過程中也轉變為堅定的自然保護主義者。經歷多年之後，鳥類、昆蟲和其他動物成群結隊地重返這片已恢復生機的土壤，並開始在此繁衍生息。鳥類的種類和數量的增長尤其令人驚嘆，其中包括了在全英範圍內數量銳減的夜鶯和斑鳩。農場裏還出現了著名的「五大獸」——塔姆沃思豬、埃克斯穆爾矮種馬、長角牛以及紅鹿和黏鹿，以及「五小獸」——紫蛺蝶、斑鳩、貝氏蝠、遊隼和夜鶯，牠們要麼輕快地飛翔和奔跑，要麼悠閒地吃草和覓食，這裏儼然成了「動物之家」。

英國作家伊莎貝拉·特里在早前出版的《野性》（Wilding）一書中，以優雅的筆觸描述許多克內普農場令人驚喜的細節，不經意間成了文學範本。比如在蘇塞克斯方言中，用來形容各種泥土的詞彙超過三十種：暴雨過後泥濘的田間小路用clodgy形容；黏糊糊、臭氣熏天的泥土用gawn；腐

聖經中有一個挪亞方舟的故事，提到大量動物被裝上船保護起來，以便在洪水退去之後，能讓地球重新充滿生物。在英國，有一個現實世界中的「挪亞方舟」，它的誕生出於偶然。



◀一隻白鵝在英國倫敦濕地中心的水邊覓食。 新華社

爛有機物形成的黑色泥土用gubber形容；一片泥濘不堪的景象用ikes；黏糊糊的黃色黏土用puglab等等，諸如此類的詞彙不勝枚舉，也生動地還原了莊園的質樸面貌。書中也充滿抒情和頓悟的時刻，比如，查理被一場「暴風雪」般的彩蝶群所震撼，體驗了某種奇妙的景象。「一隻蝴蝶的叫聲幾乎聽不見。」書中寫道，「但成千上萬隻蝴蝶卻擁有自己的呼吸，就像瀑布的回流或積聚的鋒面。牠們振翅的低吟，以超自然的波長敲擊着，彷彿能將世界分解成原子。」

正如作者特里所指出，《野性》講述的不僅僅是一個農場野化的故事，更是探討如何恢復土地和靈魂。因為人類對自然世界的破壞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多年前寫成的《吉爾伽美什史詩》，「我們把森林變成了荒地。」同名英雄說道，「我們該如何向神明交代？」而克內普農場的成功證明了，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上養活近百億人口的同時，完全可以留出更多空間給野生動物。

實際上，全球範圍內一些無意間讓野生動物回歸自然的事例，也為人類「抄功課」提供了有益借鑒。比如亞洲一些非軍事區就棲息了許多稀有鳥類，如丹頂鶴和白枕鶴，以及阿穆爾鱗鯉、亞洲黑熊和麝鹿等哺乳動物。在一九八六年切爾諾貝爾核事故後設立的禁區，猞猁和歐洲野牛等動物的數量也出

現回升。人們對這些地方及其可能預示的未來充滿好奇，這種好奇心在二〇〇七年艾倫·懷斯曼的暢銷書《沒有我們的世界》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書中探討如果人類消失，自然環境和人造環境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很值得一讀。

有英國自然學家認為，從克內普莊園案例來看，野化是一個旨在最大限度提升生態系統豐富度的積極干預過程，也是一種開明的、具有生態意識且充滿活力的園藝方式。當動物消失、土壤退化或土地貧瘠到一定程度時，一個豐富且高產量的生態系統將無法自我重建，重新引入已消失的動植物有助於扭轉這一趨勢。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人為野化」一詞出現以來，該概念和實踐已逐漸得到推廣，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一九九五年將狼重新引入懷俄明州的黃石國家公園。狼群捕食了大量的麋鹿，這使得樹木得以重新生長，進而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大大增加了公園內生物的總量 and 多樣性。

普立茲文學獎得主理查·鮑爾斯曾指出，人類焦慮的很大一部分源自於「物種孤獨感」，而恢復生態多樣性無疑是解藥良方。按《野化》（Feral）一書的作者、英國野化計劃組織創辦人喬治·蒙比奧特所說，到二〇三〇年僅有英國國土面積的百分之一會恢復自然生態，可謂任重道遠。

葉靈鳳接棒許地山(下)

惜僅僅開了個頭，便不幸撒手人寰。

初到香港，葉靈鳳主要通過編輯報刊、翻譯外文、撰寫政論、組織活動，進行抗日文藝宣傳。雖然身處海隅，心中卻無時不「遙對着祖國」，總難免幾分過客心態。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葉靈鳳日記云：「報載香港邊界因界石損壞，香港政府要求中國會同勘定邊界，擬準這機會寫一篇關於九龍割讓和租借的論文。」這是葉靈鳳對於香港史地研究的首次明確表達。一九四七年，《星島日報》允他主編一個副刊，他便

定名為《香港史地》，在《發刊詞》中，他這樣解釋辦刊的旨趣：「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地方，我們可說太缺乏注意了，更談不到學術上的研究。過去對於香港這地方的一點自然史地研究成績，可說都是外籍人士做的。」葉靈鳳立志要做的，就是打破外籍人士的話語壟斷，寫出中國人自己的香港。

許地山去世後，葉靈鳳多次到港大觀許氏藏書，他所感興趣的，應該就是此類文獻。在他所寫的有關香港史地的文章中，不時可以見到對這位前驅的致

敬。例如《南宋二帝陵》說：「我不曾到過赤灣，所以不知道這座帝昺陵究作何狀，但是從前許地山先生曾去過。」一九六七年，他又寫下一篇《許地山校錄的〈達衷集〉》，認為「在今天看來，仍是一本可供參考的有用的書」。他的傳世之作《香江舊事》中《英人在廣東欠下的血債》一文，就是以《達衷集》的史料為依據。

葉靈鳳書寫香港，總數不下數百萬字。香港中華書局「葉靈鳳香港史系列」出版說明指出：葉靈鳳是「對香港歷史進行認真的研究，並寫出大量有關著作」的「第一人」。葉靈鳳接棒許地山，完成了許地山未了的一樁心願。



燈下集 李廣宇

物》發表《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略》，對於港島、離島、九龍、新界的史跡風土做了圖文並茂的介紹。文末有這樣一句話，庶幾可以透露他行文的衷曲：

太平山上有蟾蜍石。土人信那石向